

基于媒体报道看日本战后的反核运动与和平主义思潮

匡伶

提 要：从战后初期到80年代末，受内外形势的影响，日本反核运动经历了扩大化的过程，从早期单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逐渐成为和平运动的一环。60年代，在日本媒体宣传及政府政策的干预下，广岛与长崎在二战时期的核爆炸经历被放大为日本民族的集体创伤，日本国家的自我定位也从二战的“加害者”逐渐转变为核爆炸的“受害者”，自诩“世界唯一受暴国”，国内的和平运动也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此后，受害者意识成为日本“和平主义”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与日本民族在国际上的“特殊使命”相关联，成为日本谋求国际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依据。进入70年代后，日本主流媒体基本都认为“和平主义”已在日本社会扎根，且更强调“和平主义”在日本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问题上的现实政策意义。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抬头，右翼活动也随之变得活跃。

关键词：日本反核运动；媒体报道；和平运动；和平主义；受害者意识

A study of Japan's Post-war Anti-nuclear Movement and Pacifism Based on Media Reports

KuangLing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Japan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xpansion, from the early single prohibition of atomic bomb & H-bomb movement gradually became a part of the peace movement. In the 1960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Japanese media propaganda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experience of nuclear explosion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during World War II has been amplified into the collective trauma of the Japanese nation, and the self-positioning of Japa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perpetrator" of World War II to the "victim" of nuclear explosions. The domestic peace movement has also been endowed with special social significance. Since then, victim conscious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Japan's "pacifism", and is therefore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al miss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has become the basis for Japan to seek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entering the 1970s, Japanese mainstream media basically

believed that pacifism had taken root in Japanese society, and more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 policy significance of pacifism in Japan's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guarante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Jap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nationalism rose in Japan, and right-wing activities also became active.

Key words: Japanese anti-nuclear movement, media reports, peace movement, pacifism, victim consciousness

经过战后二、三十年的恢复，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在经济上已跻身世界一流强国，随之而来的是追求自身的国际地位。“唯一受爆国”的国家意识不仅具有团结日本国民的作用，以“受害者”身份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更成为日本国家寻求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外交方针。这一国家政策的转变体现在反战研究上即是有关东京空袭、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等的研究成果增多，代表性著作如“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写并于1974年6月至1979年10月相继出版的56册系列作品：『広島・閃光の日・30年』『長崎が死んだ日』『炎と叫喚の記録：和歌山市空襲』『焦土からの叫び：3・10東京空襲』『沖縄戦：痛恨の日々』等，每册聚焦一座城市，范围遍布日本全土，主要表现为日本各地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此类成果主要通过唤起人们对战争之伤的记忆来宣传反战和平思想，但在叙事方式上，过于强调与渲染日本民族的“受害者”身份，加上日本政府的刻意渲染与宣传，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经历逐渐上升为日本民族的集体性创伤。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日益兴起的反核运动对日本亦有影响，尤其是1982年在美国爆发的百万人规模的反核运动，在自诩“唯一受爆国”的日本引起

了强烈共鸣。在该事件发生后，日本多家期刊出了特辑来讨论“反核”问题，代表性论文有「核軍縮と日本の平和<特集>」（『月刊社会党』，1982年4月）、「反核・反戦平和のたたかひの拡大を<特集>」（『月刊自治研』，1982年8月）、「反核・反戦・平和のたたかひ<特集>」（『労働運動』，1982年8月）等。研究视角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法律、工会、文艺等各领域，堪称日本全社会参与的重要话题。本文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时期的日本媒体报道，梳理日本战后反核运动及意识的发展变化，考察日本社会运动背后的政治经济意图。

一、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媒体舆论导向

1954年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以及第五福龙丸原子弹爆炸事件激起了日本国内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不同于反对基地等民族主义运动，该运动提倡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路线：为“保卫人类的生命与和平”。

今堀诚二是该运动早期的核心人物，于1956年出席第二届世界大会，他在回忆会议情况时表示：“第二天的分会议题也

涉及了冲绳问题。（中略）日本本土代表纷纷表态，认为如果不停止扩张冲绳基地，就会导致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本土和冲绳居民都无法摆脱美国的统治。”^[1]在这个时候提出冲绳问题本身就说明战后和平运动并非出于对战争的总结，而是出于对热核战争危机的担忧。上述大会宣言还表明，即使有问题也并非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而是讨论日本民族的“从属”地位。更进一步说，这是在强调要让“软弱”的国家振作起来，而非质疑国家本身。

这种期待日本摆脱“从属”地位的观点与1955年核爆受害者以国家为对象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逻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使得核爆受害者无法向美国要求补偿，因此日本国家应当承担补偿责任。换言之，日本的从属地位阻碍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日本人民的利益受制于日本国家的从属地位。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本身并非坏事，但必须弄清的是，日本人民利益受损并非因为日本放弃了对美赔偿请求权，而是在于日本政府是战争的发动者。这说明在“民族”或“国民”这一框架下建立的主体很容易掩盖其内部问题，而且这也会产生对外欺骗。

安井郁从早期就开始参与禁核运动，他在1957年作为日本代表出席在埃及举行的亚非诸国会议，并在大会上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而道歉：“日本国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中略）日本国民的战争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略）从太平洋战争以来，在日本国民的心中，特别是家庭主妇和母亲们的心中，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日本国民下定决心，无论今后发生什么事，绝对不会发动战争。”^[2]他的这段话中完全

没有提及日本自卫队的升级、在东南亚谋求经济权益并从中获利的人。反过来说，他没有深究那些政策相关人员的责任，那些人脱胎换骨成了“日本国民”，也由此关闭了进一步加深战争责任认识的途径。他还表示：“第一颗原子弹投在了亚洲一角，此事具有特别意义。美国在太平洋上继续进行核试验，英国特地从本国跑到地球背面的太平洋进行氢弹爆炸实验。（中略）听说法国的实验将在撒哈拉沙漠中进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意图，他们无视亚非诸国的利益，仅将太平洋和非洲大陆用于一己之利。”^[3]他在此将“日本国民”与亚非国家的国民相提并论，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格局。

基尼岛的核试验让日本国民看到了美国企图带领人类走向灭亡的企图。但从1958年开始，关于如何确定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的“国民”范围以及运动性质的质疑开始增多。尽管如此，这也不是运动内部发展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国际权威的动向。1956年世界和平评议会特别大会上，和平运动出现泛化倾向，在西欧和平运动中，和平运动和独立运动相分离的倾向增强。

进入60年代后，日本媒体在通过对二战时的核爆炸问题进行回顾与反思，确立了新的舆论导向。1963年8月15日，《朝日新闻》在社论中首次提到了二战时期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炸事件，视之为新民族主义核心要素的日本国民共同体。关于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炸，此前在50年代也曾出现在社论中，如1954年8月15日的《读卖新闻》社论、1956年8月15日《朝日新闻》的社论等，但当时主要是作为少数被炸者的个人经历加以报道，而此次60年代的社论则是将原子弹

爆炸作为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经历，使得日本国民的使命感与唯一被炸国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朝日新闻》表示：“尽管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民族，但这并非面向特定国家和人种发泄怨恨，在否定所有战争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可以追求理想。（中略）为避免那样的斗争，努力发现全世界所有种族与民族和平共处的道路，这才是日本作为有色人种和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真正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道路。”^[4]

该报道认为，经历过核爆炸的新的国家意识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或者说，只有通过这样的民族主义，日本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在1964年8月15日的“社论”中，《朝日新闻》继续写道：“如果没有国家或社会公共的想法，人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想建设高福利国家。自他共存、和平共处、携手合作的思想是和平宪法的根本，也是高福利国家的构想。只有带着这种明确的目的去行动，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世界环境中，日本才能对抗其他民族主义，才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5]

与之相比，《读卖新闻》则将日本国民意识的缺乏与日本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认为“日本是独立的国家，但在外交上尚不能说是真正的自主，这是部分国民指责的问题，但这不仅是为政者的问题，而是在全体日本国民真正拥有爱国心时才能解决的问题”^[6]。同时，该社论也表示应该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探索日本国民的身份。但从1966年开始，日本国民的意识便从“文化与传统”转向了“作为唯一受爆国的使命”。在《读卖新闻》1966年8月15

日的社论中也表达了与60年代前半期的《朝日新闻》相似的观点：“以原子弹的洗礼这一史无前例的经历来结束战争，日本国民由此知道了战争的罪恶，了解和平对人类来说是无可替代的最宝贵的东西。因此，承担起防止战争、确立和平的使命是日本人的宿命。事实上，对这种使命的追求与日本在世界上的信用以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都有密切的关系。”^[7]

经由媒体的大力宣传，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炸被放大为日本民族的集体创伤，“唯一被爆国”代替“战败国”成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与此同时，“受害者意识”相关话题也频现报端，尽管各媒体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存在差异，但经过充分的讨论与传播，“受害者意识”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反战和平主义也因此与“唯一被爆国”日本的“特殊使命”相关联，成为日本塑造其崭新国际形象的外衣。

二、80年代日本反核运动的扩大化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了非同盟国家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会上提出了实现“新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在其“政治宣言”中，以“和平不能分割”为由，批判了欧洲独有的“缓和”界限，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使用、生产、存储及实验，并要求迅速举办“世界裁军会议”。1976年，在科伦坡举行第五次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召开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同年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非同盟国家75个国家再次共同提议召开特别大会，获得全会一致

同意,最终于1978年召开了第一届特别大会。1979年,首先在荷兰兴起反对部署战区核武器的运动,随后逐渐向德国蔓延。1981年秋天,在波恩、伦敦、普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各国的首都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核游行。反核运动的高涨还与美国1979年爆发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有关,该事件推动了反核电站运动的高涨。198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非同盟国认为第一次会议最终文件中的全面裁军计划具有法律效力,也设定了裁军的期限、列出了裁军日程的具体措施,但西方认为全面裁军计划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规定实施时间,仅是谈判框架,双方的意见发生冲突。但不管怎样,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核运动的高涨,会议期间的6月12日纽约就举行了100万人规模的大型示威游行,联合国收到了约1亿人要求裁军的签名。

另一方面,日本在198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设立“提高联合国效率的贤人会议”,并提出以日本为中心的联合国改革框架。随后在1988年第三届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上,时任首相竹下登发表演讲“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并制定国际紧急援助队法案。尽管日本自卫队不能参加国际紧急援助队,但当时应该已经开始摸索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兵的方法,所以后来才能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尽管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反核运动高涨是此次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的重要成果。不仅规模大、范围广,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运动”模式:和平运动与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等融为一体,或者说,传统的以劳工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减少,生态运动

和女权运动凸显出来了。

在日本,在第二届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召开的前一年1981年,就成立了“第二届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 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国民运动联络会议”,并开展签名运动。“国民运动联络会”分别于1982年3月和5月在广岛和东京举办了“为了和平的广岛行动”集会,参与者分别为20万和40万。在裁军特别总会上,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多达7000多万人的签名,另有1万3千名民间团体代表参加了会议。1982年1月发表“文学者控诉核战争危机的声明”以及各种“职能集团和同行业者聚集一处的声明和呼吁”,妇女团体也开展了活跃的活动。在宗教界,除了日本基督教协会决议了“关于和平的呼吁”外,1983年3月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一致通过呼吁废除核武器和坚持非核三原则等的决议,并确定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如在第二次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上派遣观察员等。1980年,“反对向太平洋扔弃核废料的马里亚纳同盟”代表访问日本,此后日本便开始讨论停止向海洋排放核废料的问题。这些都是日本在反核运动中取得的成果。

关于“文学者声明”所言“在唤起广大市民关心核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菅孝行也表示了公开质疑,他的批判应该可以说是从整体上揭露了反核运动存在的问题:“可以指望联合国来实现反战和平吗?是否有必要考虑存小异,而不是弃小异就大同?反核是否应该包含反对核电站等‘和平使用’?日本一边倡导‘反核·裁军’,一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推进军备扩张,还有些国家摆出一副反核的姿态,

实际却是核武器保有国，对此，我们是否应该拆穿它们的假面具？民社党、同盟等赞成扩军，有些人认为自卫队符合宪法、还有人支持全斗焕的军事政权，我们可以把他们都看作是‘反核论者’吗？可以标榜自己的‘被爆国体验’吗？这是否模糊了加害者的性质？推进减轻刑法者、赞成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推进‘劳战统一’的势力，这些人可以成为反核运动的同志吗？另外，桑原重夫认为宗教人士的反核运动是有问题的，立正佼成会会长庭野惠敬在1981年促成了罗马法皇与日本天皇的会谈，由他所指导的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日本委员会是具有欺骗性的。总之，忽略日本在亚洲、在过去以及现在所做的事来谈反核是不合适的，遮蔽核电站问题也是有问题的。”^[8]

该时期对冲绳问题的忽略也说明反核运动存在问题。在反越战、全共斗的时代，“和平民主主义”运动具有“宽泛主义”的性质，而反核运动作为其延续，也是一项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而非宣告“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日本的反核运动高涨的原因不仅是新冷战的加剧以及世界范围内反核运动的高涨，还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有关。“核武器实际上被带到了日本”这一事实令外界怀疑自佐藤政权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秉持的“非核三原则”政策实际已经名不副实。

另一个是防卫问题。在1978年时，栗栖统幕议长公开批判“专守防卫”。在他卸任后，在时任首相福田赳夫的指示下，有事立法研究加快了进程，这一方针推动了日美共同作战研究。1981年，铃木善幸首相访美，双方共同发布

日美共同声明，明确将日美之间的关系称为“同盟关系”，并提出了海上防卫。从1978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支付驻日美军的驻留经费，但实际是通过增加日本在安全保障领域的负担来补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黑字。但“综合安全保障”并非出于和平目标。当时，两伊战争引起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在日本国内制造了恐慌，因此日本在经济方面扩大了“安全保障”的概念，将有事立法研究纳入其中，并提出行政改革等国内体制重组的总路线。1983年中曾根政权成立后，继承了“综合安全保障”路线，明确提出日美同盟路线，并提出国铁分割、民营化等国内重组方案。

三、日本媒体的“和平主义”宣传及其与日本经济和安保政策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反核运动并非都与反核有关。在1982年的“广岛行动”和“东京集会”中，在主办团体的组织动员下，参加者除了支持“反核·裁军”外，还有反核电站、反安保、反基地、反公害等多个反对目标。该运动为后来的全国性的和平运动奠定了基础，如1984年的“禁止配置战斧 全国运动”“横须贺五千人大集会”等都与此有关。

和平运动的不断扩大使得“和平主义”思潮也迅速在日本社会蔓延。进入70年代后，尽管当时的日本主流媒体对“和平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日本已经建成一个“和平国家”。但在日本媒体积极宣扬“和平主义”的同时，也对“和平主义的落实”表示出

了担忧。如《读卖新闻》表示，在经济大国日本，只有“和平”二字完全符合民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仅此一点是每个日本国民的骄傲”^[9]。《每日新闻》也表示，“日本无疑可以成为‘和平国家’”，但国民意识中存在的“习惯和平”的思维，实际是和平主义虚无化的表现，也是关系到世代相续的问题^[10]。而且，随着战争亲历者不断离世，了解战争悲惨的人越来越少，新一代人会越来越无法理解和平的价值，因此《每日新闻》特别强调“现在的和平是以昂贵的牺牲为代价的”，主张必须进行和平教育，以免丧失对战争悲惨的认识^[11]。

关于“和平主义”与日本安保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早出现在《朝日新闻》于1972年8月15日刊登的社论中，文中写道：

中日邦交恢复正常是日本战后长期以来的心愿，还可由此开展自主外交。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这是避免因经济发展而与海外各国产生摩擦与紧张、实现共存的第一步。要开展自主外交，日本必须有自主的外交原则。简言之，日本应该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不仅要与美国、中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也要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间建立起新的经济合作关系，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12]

《每日新闻》也表示，“日本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国外进口，然后做成商品出口以赚钱”，“在这一情况下，要维持日本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是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和谐关系。如果要维持现在这样的高度经济增长政策，当然要确

保资源，扩大市场。（中略）为了我们作为和平国家继续繁荣，需要国际合作。”^[13]

70年代的《读卖新闻》将战后经济复兴直接与战后改革联系在一起，表示“如今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稳定在世界第三位，原因除国民勤奋和对外开放外，最重要的是带来战后变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结构的改变”^[14]。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前，《读卖新闻》在讨论外交关系时把论调的重点放在了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上，但在1973年后所关注的对象有所增加。他们认为问题在于“东南亚、非洲以及欧美各国的反日情绪都在增强”，因此“为了避免再次陷入国际孤立而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资源也没有军备的日本要想在今后的世界生存下去，只有和平一条道路。不仅是国内，今后的日本也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15]。在1974年8月15日的社论中也强调了国际合作政策，认为“优先提供经济援助并非为了减少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不仅是为了那个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掌握经济实力、政治上安定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16]。该时期的《读卖新闻》认为，为了确保繁荣和安全，“依赖海外资源和能源的日本除了更注重国际主义、以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为目标外，没有其他可以生存的道路”^[17]，强调和平路线和国际合作是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日本安全保障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自80年代后半期起，《读卖新闻》的论调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要“支持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并将和平主义定位成日本的使命。如1988年8月15

日的社论中写道：“在感受我国难得的和平与繁荣时，要努力将这种喜悦扩展到全世界也是我国的责任和义务。”^[18]与此相对，70年代《每日新闻》的社论在论述“经济与和平”主题时，更关注的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带来的各种问题，文中表示，日本社会成了一个“重视物质和金钱”的社会，强调“物质繁荣的虚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富裕后的精神颓废”问题等^[19]。但在1979年8月15日的社论中，《每日新闻》从经济大国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和平主义与经济繁荣的问题上，这与《读卖新闻》在70年代的立场很相似，都是将日本战后的和平路线与经济繁荣相结合。

《朝日新闻》讨论“和平与经济”相关主题的报道比其他两大报纸要少，70年代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弱点上。如1973年8月15日的社论关注了“日本正面临的危机状况”，强调“通货膨胀使得大多数日本国民的生活受到限制，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设计，扩大了分配的不平等，使社会体制陷入危机”，并在结论中表示，“通货膨胀带来的不仅是国民生活的不安，是否继续目前的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令人怀疑”。但进入80年代后，《朝日新闻》和其他两大报纸一样，都重视国际合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1980年8月15日的“社论”表示，“日本位于亚洲，而且没有资源，因此强烈需要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密切关系”。但他们强调日本的使命感和特殊作用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站在质疑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立场上。

此外，对《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来说，和平主义有“轻武装”和

“非核”的意思，他们认为战日本是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这一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80年代前半期，《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都主张“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之一，是因为采取了轻军事重经济的政策”^[20]，

“日本的这一特殊经历使其有资格向国际社会推广自己的经验”^[21]。因为日本和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日本是“唯一受核武器爆炸伤害的国家”^[22]。《朝日新闻》表示“出口‘核过敏’的战略”是日本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23]；《每日新闻》也认为坚持呼吁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是日本的重要课题^[24]。这种受害者意识成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地位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结语

从战后初期起，反核运动在日本经历了扩大化的过程，从早期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逐渐成为和平运动的一环。在日本媒体宣传及政府政策的干预下，二战时期的核爆炸经历被放大到日本全民族的集体创伤，日本国家也从二战的“加害者”逐渐转变为核爆炸的“受害者”，自诩“世界唯一受暴国”的和平运动也被赋予特殊的社会意义。受害意识成为日本“和平主义”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与日本民族的“特别使命”相关联，成为日本谋求国际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依据。进入70年代后，主流媒体基本都认为和平主义已在日本社会扎根，但更强调和平主义在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问题上的现实政策意义。至90年

代，在国际上，海湾战争爆发、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朝鲜半岛核危机爆发；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等，尤其是朝鲜核试验与福岛核泄漏事故，几乎令整个日本暴露在核威胁之下。

在这一系列形势变化中，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1976年，以昭和天皇举办在位50年典礼为契机，立正佼成会、神社本厅等相继成立，推动了年号法制化运动以及地方议会决议运动，最终于1978年实现了年号法制化。言论界的右倾表现也有所增强。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50年代的运动框架与新冷战模式同时在日本国内复苏，或者

说是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核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及其运动逻辑在日本复苏了。战后初期反战和平运动中的意见领袖清水几太郎与吉本隆明在60年代安保斗争中都更靠近全学联主流派，但此时都走向了反共主义，这也体现了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日本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他们一贯的风格，也是日本战后反战和平运动的负面影响。无论他们的言论或接受这些言论的人，都表现出对现状的绝对肯定。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民族主义思潮抬头，这也为后来日本承认自卫队海外派兵以及参与防灾和治安埋下了伏笔。

注釋:

- [1] 今堀誠二：『原水爆禁止運動』，潮新書，1974年，第13頁。
- [2] 安井郁：「民族独立運動と核実験禁止運動」，『国際法学弁証法』，法政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52頁。
- [3] 前掲[2]。
- [4] 「日本人だという意識」，『朝日新聞』，1963年8月15日。
- [5] 「八月十五日の思い」，『朝日新聞』，1964年8月15日。
- [6] 「終戦17年目に際して思う」，『読売新聞』，1962年8月15日。
- [7] 「終戦21周年を迎えて」，『読売新聞』，1966年8月15日。
- [8] 池田浩士、菅孝行、天野恵一：「座談会 抵抗としての“反核”とは何か」，『批評精神』，1982年6月，第134頁。
- [9] 「平和は教育によって前進する」，『読売新聞』，1980年8月15日。
- [10] 「第二の国造りに立上がろう」，『毎日新聞』，1975年8月15日。
- [11] 前掲[10]。
- [12] 「八・一五に思う 変容するベトナム戦争」，『朝日新聞』，1972年8月15日。
- [13] 「平和と繁栄は国際協調の中で」，『毎日新聞』，1973年8月15日。
- [14] 「戦後四半世紀の曲がりかど」，『読売新聞』，1970年8月15日。
- [15] 「戦後28年・一大転機に立つ日本」，『読売新聞』，1973年8月15日。
- [16] 「曲がり角で迎えた8月15日」，『読売新聞』，1974年8月15日。
- [17] 「昭和史の悲しき語る敗戦の日」，『読売新聞』，1979年8月15日。

- [18] 「平和の夏に歴史の節目を思う」, 『読売新聞』, 1988年8月15日。
- [19] 「三十一年目の終戦の日に思う」, 『毎日新聞』, 1976年8月15日。
- [20] 「過ち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 『朝日新聞』, 1980年8月15日。
- [21] 「8・15とは何であったか」, 『毎日新聞』, 1982年8月15日。
- [22] 「過ち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 『朝日新聞』, 1980年8月15日。
- [23] 「八月十五日の今日的意味」, 『朝日新聞』, 1984年8月15日。
- [24] 「平和と繁栄の国是を大切に」, 『毎日新聞』, 1986年8月15日

※本稿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的阶段性成果, 林敏洁为本稿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